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冊

上海古籍出版

復旦大學圖書館
藏書之章

封面題簽 陳望道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 冊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875 插頁 2 字數 234,000

1964 年 8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新 1 版 198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45,901—50,000

統一書號: 10186·111 定價: 1.85 元

再版說明

本書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共分七編：一，先秦兩漢；二，魏晉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六，清；七，近代。第一、二、三編爲上冊，第四、五編爲中冊，第六、七編爲下冊。

本書編寫，力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比較系統地說明我國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和文學理論鬥爭的實際情況，但由於編者理論水平和能力的限制，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希望讀者指正，讓我們再來修改和提高。

在編寫過程中，我們參考了一些國內學者的有關論著，從中得到不少的幫助和啓發，文中未能一一註明，特此誌謝。

本書原由劉大杰先生主編，由我們組內幾位同志集體撰寫。劉先生逝世後，由我們繼續編著。參加上冊編寫的有劉大杰、王運熙、李慶甲同志。這次再版，在個別地方作了修改。

王運熙 顧易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目錄

再版說明

第一編 先秦兩漢

緒論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學批評

第一節 孔子以前人們對於文學的認識

第二節 孔子

第三節 墨子

第四節 孟子

第五節 莊子

第六節 荀子

第二章 漢代的文學批評

第一節 詩大序

第二節 司馬遷

第三節 揚雄

第四節 班固和王逸·····

王充·····

····· 六八

第二編 魏晉南北朝·····

六三

緒論·····

八三

第一章 魏晉的文學批評·····

八九

第一節 曹丕·····

八九

第二節 陸機·····

九八

第三節 晉代的賦論及其他·····

一〇六

第四節 葛洪·····

一一三

第二章 南北朝的文學批評·····

一九

第一節 文筆說·····

一九

第二節 聲律論·····

二五

第三節 裴子野、蕭統、蕭綱·····

三三

第四節 顏之推·····

三九

第三章 劉勰《文心雕龍》·····

四五

第一節 緒說·····

四五

第二節 基本思想·····

四九

第三節 論內容、形式和體製

一五六

第四節 論風格

一六五

第五節 論文學的產生和歷史發展

一七三

第六節 論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

一八〇

第七節 結語

一八八

第四章 鍾嶸《詩品》

一九三

第一節 緒說

一九三

第二節 論五言詩的思想藝術標準和歷史發展

一九六

第三節 論五言詩作家及其流派

二〇二

第三編 隋唐五代

二二

緒論

二二

第一章 隋和唐代前期的文學批評

二九

第一節 隋代文論和唐初史家的文學觀

二九

第二節 劉知幾

三六

第三節 陳子昂和李白

三四

第四節 殷璠

三四五

第二章 唐代中期的詩論

二四九

第一節 杜甫和元結	二四九
-----------	-----

第二節 白居易	二五七
---------	-----

第三節 元稹	二六六
--------	-----

第四節 釋皎然	二七二
---------	-----

第三章 唐代古文運動的理論	二八二
---------------	-----

第一節 古文運動的前驅者	二八九
--------------	-----

第二節 韓愈	二八九
--------	-----

第三節 柳宗元	二九八
---------	-----

第四節 韓門弟子	三〇四
----------	-----

第四章 唐代晚期和五代的文學批評	三一五
------------------	-----

第一節 杜牧和皮日休	三一五
------------	-----

第二節 司空圖及其他	三二三
------------	-----

第三節 五代的文學批評	三三三
-------------	-----

第一編 先秦兩漢

緒論

先秦時代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萌芽階段，這個階段有關文學的意見，只有片段的資料。它們大抵散見在各種學術著作中，成篇的專門論述文學的文章尚未出現。

文學思想的萌芽 周代的文化學術有很高的發展。相傳爲孔子編定的六經，絕大部分產生於周代，《詩經》也都是周詩。由於詩歌創作的發展，從西周到東周春秋時代，人們逐漸形成了對詩歌作用的一些認識和見解，那就是：作詩可以表達自己的哀樂之情，表達對別人或事物的頌美或諷刺；通過采詩觀詩，可以瞭解人們的思想感情，考察民情風俗。這種認識，以後發展成爲比較完整的『言志』、『美刺』、『觀風』等詩歌理論。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舊的奴隸制度逐步解體，新的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在當時社會劇烈變化的過程中，湧現出許多思想家，他們依據不同的階級屬性，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政治、經濟、哲學等方面的主張，形成了諸子爭鳴、學術繁榮的局面。在諸子百家的論著中，包含着不少有關文學的見解，這些雖然還沒有成爲完整的篇章，但其中已

有不少較為深刻的原則性的論點，對於後世的文學批評，有很大的啓發和影響。特別是儒家的文學思想，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這時期人們所用的『文學』這一名詞，內容比較寬泛。所謂『文』或『文學』是文化學術的總稱，具體地說，就是《詩》、《書》、《禮》、《樂》等著作，而其中只有少數是文學作品。當時人們常用的和文學有關的另一個名詞是『言』或『言辭』。它表現在口頭上，是人們的日常談話和政治外交辭令等等；表現於書面記錄，主要是政治文告、法令和學術著作等等。它的含義也很寬泛。因此，當時人們對於文學的見解，大都包含在對於文化學術的見解之內。當時的思想家，常常提到關於詩的意見，那是比較純粹的有關文學的見解。但《詩》三百篇大都入樂，詩樂緊密配合；人們對於詩歌和音樂的見解，也常常互相聯繫，有時很難分開。基於上述情況，這段文學批評史的內容，特別不容易跟學術思想史、美學思想史劃出清楚的界線來。

儒、墨、道、法諸家的文學觀 先秦諸子的主要學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都在他們的著作中，發表了一些有關文學的意見。

儒家的創始者孔子很重視文學（文化、學術）。他認為學習文學，是人們提高道德修養、從事政治社會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他贊美『詩三百』的內容主要是『無邪』。在語言表現方面，他首先強調『質』，但也重視『文』（指文采），主張『文質彬彬』。他認為詩歌有『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作用。孟子在詩歌的閱讀和理解以及修養和創作的關係問題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知

人論世』和『知言養氣』各種主張。荀子對文學的內容和作用，初步提出了明道、徵聖、宗經的具體標準。荀子和出於孔子後學的《禮記·樂記》，都非常重視詩和樂，一方面指出了詩和樂產生的基礎、詩和樂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及其認識作用；另一方面強調詩和樂對人們的教化意義。不論孔子、孟子、荀子，都很重視文學、言辭、詩和樂的社會功能，都主張文學藝術必須爲教化服務。儒家這些思想，初步指明了文學藝術的特點和作用，同時又反映了統治階級對文學的要求，故能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得到發展，而在文學批評史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墨家的創始人墨子學過儒者之業，也很重視文學和言辭，主張文學、言辭要切合實用。但他不滿儒者的繁文縟節，勞民傷財，反對文采，倡『非樂』之論。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不但同意墨家重質輕文的意見，而且上承商鞅之說，強調耕戰，認爲文學、言辭虛浮而不切實用，主張一概禁絕。墨家只是反對文飾，重質輕文，法家不但反對文飾，而且整個否定了文學、言辭的作用，對文化學術的發展，完全採取了排斥的態度。

道家的主要人物老子和莊子，對文化學術都持着否定態度。他們反對文學、言辭、文采、音樂等等，提出『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老子》），『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同上）等等主張。道家這種取消文學、藝術的主張是不合理的，但他們的崇尚自然的主張被後人運用到文學批評上，提倡自然美以反對雕琢堆砌，卻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莊子》書中的一些優美的寓言故事，是用來闡述他的哲學思想的，但有些故事卻說明了要熟練地掌握技藝，必須長期實踐和專心一致，這些原理被後人引伸到文學

創作上，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漢代文學批評的演進 繼先秦之後，兩漢的文學批評有了新的發展和成就。漢代的文學批評，和當代的政治情況、學術思想有密切的聯係。漢初統治者懾於農民起義的威力和秦朝短期覆滅的教訓，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賦稅和剝削，與民『休養生息』。學術方面，大力提倡黃老，思想還沒有受到嚴格的限制。在以抒發感慨爲主的漢初辭賦和劉安、司馬談的理論著作中，可以看到這種風氣。略爲后起的司馬遷，繼續地發揮了這種精神。從武帝到宣帝，是西漢帝國政權最鞏固、國勢最強大的時期。特別是武帝，在學術思想方面，採取了『獨尊儒學、罷黜百家』的政策。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歌功頌德、追求形式的賦，日益繁榮；在文學批評中，儒家取得了統治地位。當時的批評家，即使對於作家作品的評價不同，但無不標榜儒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縛。東漢在外戚宦官爭奪政權的尖銳鬭爭中，加緊剝削人民，形成黑暗混亂的局面。由於統治者的提倡，今文經學和讖緯迷信相結合，成爲當代的統治思想。桓譚、王充、張衡諸人，對於欺騙人民的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批判。特別是王充運用這種精神，在文學理論中作出了貢獻。漢代的文學批評，是在當代政治影響和學術思想鬭爭中成長起來的，是在當代辭賦、散文日益繁榮發展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

兩漢時代有關文學的意見，雖然大部分也還是片段的，散見於哲學、歷史等學術著作中，但已出現了一些專篇的文學論文，如《毛詩序》、班固的《離騷序》、《兩都賦序》、王逸的《楚辭章句序》等，議論較

有系統，觀念也較為明確，這是前一階段所沒有的現象。

兩漢時代的文學創作，整個講來，較過去有很大發展。韻文方面，產生了不少優秀的樂府詩歌，奠定了五言詩的基礎。辭賦在《楚辭》、縱橫家辯說的影響下，產生了很多的作家和作品；西漢成帝時「奏御者千有餘篇」（班固《兩都賦序》）；劉向、劉歆編校圖書，在《七略》中特立《詩賦略》論述詩賦，就是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史記》和《漢書》都為辭賦家立了專傳。這些都是辭賦由「六義附庸、蔚成大國」（《文心雕龍 詮賦》）後的新現象。在散文方面，除開一部分具有文學價值的學術、歷史著作外，各種體裁的單篇文章逐漸多起來了，論說、書序、奏議、書啓等等，不一而足。此外還有韻文體和韻散結合的文體頌、讚、箴、銘、哀誄、碑文等等。辭賦和具有一定文學性的文章的大量產生，促使人們開始注意到文學作品和學術的區別。從《史記》、《漢書》的不少用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習慣上用「學」或「文學」稱學術，用「文」或「文章」稱文學作品。人們逐步提高了對文學的特點的認識，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漢代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以後，經學得到了正統的地位。儒家經典中文學性最強的是《詩經》。漢代關於詩歌的理論，集中表現在《毛詩序》和鄭玄的經書注釋中。它們一方面繼承了先秦儒家的詩論，一方面適應着時代的需要，通過對《詩經》的若干重要問題的解釋，建立了詩歌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標準。他們強調詩的培養道德、移風易俗的作用，強調詩的「美刺比興」、「主文而譎諫」、「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特色；要求詩歌內容符合儒家的倫理標準，密切為封建政治服務；語言要委婉含蓄，

風格要溫柔敦厚。漢人的『詩教』在這裏獲得了比較系統的理論闡述。這是過去長時期來儒家詩論的總結，對後代的文學批評有很大影響。

揚雄是西漢著名的儒家學派的學者，在文學主張上強調明道、徵聖、宗經。這種主張上繼孟軻、荀卿，下開劉勰、韓愈等人的議論。這個傳統說明了在長期封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對文學理論批評所起的深刻影響。

由於經學的發展，《詩經》被推崇為典範，形成了漢代文學批評依經立論的特色：以儒家經典為標準來評價、解釋作家作品，以合於經典者為優，不合者為劣。我們看到，不論是兼採各家思想的劉安和司馬遷，或者比較純粹的儒家學者揚雄、班固、王逸，都表現出這種特點。

對於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是漢代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內容。西漢劉安作《離騷傳》，認為《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可與日月爭光。司馬遷《史記》接受了這一觀點，並進一步對屈原的高潔品格和愛國精神，作了高度的贊美，對屈賦的『怨惻』特色，給予充分肯定。以後揚雄雖也大力推重屈原的作品，但他又從『明哲保身』、『全身遠害』的人生哲學出發，對屈原的以死殉國的鬪爭精神表示不滿，跟劉安、司馬遷持有不同的看法。到了東漢，班固繼承並發展了揚雄的意見。班固雖然也肯定屈原作品的『弘博麗雅』，但對屈原的忿恨沉江和作品的怨刺內容，深致貶抑，認為他是『露才揚己』，『非明智之器』。班固對屈賦中的神話傳說題材也表示不滿，認為『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以後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對屈原的為人及其作品的思想、藝術特色，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並與儒家經典作比較，充分肯

定了屈原的高尚品德和屈賦的崇高價值。王逸在評價屈原時，強調了儒家思想的『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的一面，和揚雄、班固所強調的『明哲保身』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立。在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上，王逸有力地駁斥了班固的意見，但他把屈賦看作只是儒家經典的承襲，又貶低了屈原作品的獨創精神。

以《詩經》爲準繩來對辭賦進行評價，是漢代文學批評的一般現象。辭賦評價中除上述關於屈原的評價外，是對於宋玉、司馬相如等作家的批評以及對漢賦的估價。司馬遷對辭賦及其作者採取基本肯定的態度。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對屈原、賈誼作了很高的贊美，對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則認爲『終莫敢直諫』，略著微辭。他在《史記》中爲司馬相如立專傳，說相如的賦『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指歸在諷諫君主節儉，和《詩經》相合。揚雄後期思想發生很大轉變，從過去的努力作賦轉而批判賦，認爲賦的描寫是『勸百諷一』，徒勞無益，『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他對於賦的評論是：『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他在這方面擊中了漢賦誇張過度、堆砌辭藻的弊病。東漢的王充，在評價辭賦的問題上，主要接受了揚雄的觀點。班固對辭賦的態度，與揚雄不同。他在《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引用了司馬遷對相如的評價，同時對揚雄『勸百諷一』的主張表示不滿。在《兩都賦序》中，班固認爲賦是『古詩之流』，『雅頌之亞』，可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以《詩經》爲標準，肯定了漢賦的地位和作用。

對《史記》的評價，也是漢代文學批評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內容。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明自

己寫作《史記》，是以孔子的《春秋》爲楷模，通過歷史事蹟的記錄，褒善貶惡，辨明是非，表現自己的理想，上繼古代聖賢『發憤著書』、『思垂空文以自見』的傳統。以後劉向、揚雄、班固等都贊美《史記》能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繼承了古代史書和《春秋》的秉筆直書的精神。但司馬遷的思想並不純粹屬於儒家範圍，《史記》一書包含了較多的『異端』思想；這些方面招來了儒家正統觀念強烈的人士的不滿。揚雄較早地指出了《史記》內容存在着愛奇而雜的缺點。到班彪、班固父子，就更具體地列舉《史記》離經背道的內容，認爲『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大加貶斥。

從上面的簡述可以看出，不論是對楚辭、漢賦、歷史著作的評論，不論是對屈原、司馬相如、司馬遷的評價，都表現出依經立論的特色。這反映出在儒家思想定於一尊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對於同一件事物的估價，雖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又必須遵從封建階級共同的準則。

王充是東漢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生長在讖緯迷信盛行的時代，在寫作上提倡『疾虛妄』，崇尚『實誠』，具有戰鬪意義。他強調寫作文章，必須注重內容，有益於社會；主張爲文應有獨創，反對因襲摹擬；主張語言應明白易曉，反對擬古而故作艱深。這些原則都是值得重視的。嚴格說來，王充的意見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其中也有一定的局限，但他在討論廣義的文學（學術）時所提出的某些理論原則，有許多好的見解，對文學作品也是適用的。類似情況，在以後晉代的哲學家葛洪、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學批評

第一節 孔子以前人們對於文學的認識

隨着社會和文學的發展，人們逐漸形成了對於文學的看法，以後逐步發展成爲系統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文學理論和批評，是在政治、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是在文學創作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但它既經出現以後，又反過來對文學創作發生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

美刺和言志 在先秦時代，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之世，陸續產生了不少優秀的詩歌，後來結集成爲《詩經》，成爲我國詩歌的第一部總集。在《詩經》的少數詩篇中，有些作者表達了自己寫詩的目的和態度，對於文學的社會作用，表現出樸素的認識。例如：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魏風·葛屨》）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風·墓門》）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小雅·節南山》）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巷伯》）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崧高》）

這些詩篇的作者們意識到：詩歌是用來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表現自己對於某些生活現象和政治情況的態度的；對於美好的事物，加以贊美稱頌，對於醜惡的事物，加以諷刺。

上面的例證表明：詩人寫詩的目的，多數是用以諷刺，對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批評。古代統治階級的人士很重視詩歌的諷諫作用，因為它可以幫助統治者考察民情，改進政治。《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師曠對晉平公的話說：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國語·周語上》記載召公諫厲王使衛巫監諺道：

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臠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國語·晉語六》記載范文子對趙文子的告語，也有古之王者『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有邪而正之』一類的話。《左傳》、《國語》講到公卿列士以至盲瞽所獻的詩，有的是自己的創作，有的可能是別人的詩，但不管怎樣，用詩諷諫的思想，和上面所引詩篇作者的認識是共通的。這種共通的認識，表明人們在很早的時期，就要求把文學創作和政治緊緊地聯繫起來，要求文學對政治發生積極的作